

一 时势造英雄

前 455 年（周定王十四年），战国时代兼并战争的序幕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轰轰烈烈地拉开了。

当时，控制着中原霸主晋国的，是以智伯、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为代表的四大宗族。他们根本就不把毫无实权的晋哀公放在眼里。四大宗族中势力最大的智伯为了独占晋国，联合并挟持韩、魏，对拒绝他勒索的赵襄子大开杀戒，将赵襄子死死围困于晋阳城中。赵国军民坚守晋阳城，但赵襄子毕竟军力弱小，财尽粮绝。晋阳城危在旦夕。关键时刻，赵襄子的谋士张孟谈临危受命，他利用韩、魏两家与智伯的矛盾，说服韩、魏掉转矛头，共同反对智伯。前 453 年，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赵军深夜偷偷掘开智伯所筑的用来水灌晋阳城的晋水大堤，滔天的洪水反而涌向智伯的军营。这时，原来与智伯一块围困晋阳城的韩、魏之军，也趁着智伯军队大乱之机，突然从侧翼发动进攻，与正面进攻的赵军一起来夹击智伯的军

队，活捉并处死了智伯，然后将智伯家族全部诛杀，瓜分了智氏的土地，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局面。韩、赵、魏实际上已成为三个独立的封建国家。

这一石破天惊的事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战国时代的来临。作为天下共同领袖和礼乐制度象征的东周王室，虽然仍保留天子的名分，但实际上已沦为末等小国，被抛弃到了政治舞台的后台，没有人再将它当回事。

奴隶制的礼崩乐坏，宣告了封建时代的到来。各国的统治者都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一方面积极推行封建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增强国力，广招人才，笼络民心；另一方面为争夺权力、土地、人口，相互间展开了残酷、血腥的战争，这些战争争夺的主要目标不再是霸主的名分，而是土地和人口。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体制革故鼎新，而其核心就是确立战时体制。各国为了生存和确立新型地主阶级政权，相继兴起风起云涌的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就大力推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政策，以发展小农经济，并将社会组织改组为郡县制；秦国的商鞅变法，也“令民为什伍”，奖励耕战，用军事原则加之于全民。因为，当时的战事已突破了“礼”的束缚，成为波及全民、关系政权存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之大事”。

变法最为成功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

国，实际上都确立了一种战时体制，使社会组织服从大规模兼并战争的需要，准备做长期的大厮杀。当然，当时的国际舞台上还有不少中小国家如宋、鲁、蔡、莒、卫、郑等等，但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主宰着当时国际战略格局的，无疑是魏、齐、秦、楚、燕、韩、赵这七个大国。中国历史进入七大国角逐称雄时代，一幕幕纵横捭阖、干戈不休、争霸兼并、你死我活的精彩话剧开始上演了。

三家分晋后，魏国捷足先登，占据了春秋时代霸主晋国的精华地区：它地处天下枢纽的中央地带——中原，据有河东（今山西南部）、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河内（今河南东部黄河以北地区）。当时人顿弱称之为“天下之胸腹”（《战国策·秦四》），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这样评价：“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交替）也。”当然，魏国所处的这一地理位置，又是典型的四战之地，四周有齐、赵、秦、楚等大国包围。当时，由于周边的大国尚未崛起，地理位置上与战略环境上的种种不利因素，还没有对魏国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魏文侯抓住时机，最早在魏国实行比较彻底的封建改革，他励精图治，广揽人才，如重用法家的开山大师李悝为相，实行变法；用乐羊为将，攻取中山国。魏武侯时，又将战略进攻的方向集中于西方，趁秦国内乱频仍、政局不稳、无暇外顾之机，起用大政治家、

战略家吴起担当西向攻秦的重任，吴起不负厚望，从秦国手中夺占了全部的“河西之地”。河西相当于今陕西河套地区南部黄河以西的地区，当陕晋之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魏国夺占河西，就将秦国势力逼退至洛水以西。在此之后，魏国设西河郡，以吴起为郡守，加强防务，保持对秦国压迫性的攻势，使“秦国不敢东向”，得以后院安宁。而魏国因据有河西之地，控制了黄河天险，则攻守自如，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在军事上，吴起还对魏国的军事制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建立了“武卒制”，对士兵进行严格的挑选和合理的训练，同时提高士兵的待遇，使军队战斗力大为增强。在外交方面，魏文侯、武侯对韩、赵两国实行联盟策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三国间的利益冲突，也为魏国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魏国有了韩、赵两国的支持，更加强盛，一跃而成为当时的第一强国，从而彻底改变了自春秋以来晋、楚、齐、秦四强争霸的战略格局，使当时的诸侯国都无法与之抗衡。

魏惠王继位以后，继承文侯、武侯的霸业，谋求统一三晋，恢复春秋时晋国的全盛地位。为此，魏惠王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四面出击，继续积极向外扩张。西夺秦河西之地，北破中山国，又与韩、赵联合，东伐齐，南破楚，不但抑制了齐、楚的进攻，而且也开拓了疆土，提高了声誉，终于奠定了霸业，其

政治地位也得到了周天子和各诸侯国的承认。

古今中外，总有一些人会被胜利冲昏头脑。

魏惠王在取得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后，不禁飘飘然起来。他权衡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在攻占秦国河西之地后，来自秦国的威胁已不足为虑，下一步就是制服敢于公然与魏争夺中原霸主之位的齐国。于是，魏惠王贸然决策将战略重点放在东方，致力于与齐国的角逐。为此，魏惠王于周显王八年（前 361 年）决定将国都迁到东部的大梁（今河南开封）。他认为，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村）远在太行山以西，难以控制东面的形势，而大梁位于中原腹地，为济水、睢水、鸿沟等数条河流的交汇点，地势平旷，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迁都以后，一方面可以直接威胁韩、赵的国都郑（今河南新郑）和邯郸；另一方面，又可以占据有利形势，控制韩、赵，西守东攻，保持对齐国的进攻势头，与齐国一争高下，以巩固魏国的霸主地位。

但这一次，魏国在战略上犯了致命的错误，未能摆脱四面受敌的困境。

本来，三家分晋之初，魏、韩、赵三国处于秦、齐、楚三大国的包围与威胁之中，而且三家分晋独立后相当长时间内未为周天子所承认，政治地位也不稳定。共同的威胁与休戚相关的利益使三国走上了联合的道路。魏国因国力和威望，加上魏文侯、武侯实行

的联合韩、赵的战略，自然成为三晋的领袖。

然而，在争夺激烈的兼并战争年代，诸侯国的关系完全是由相互间的利益关系决定的，不存在永久可靠的同盟关系。三晋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也会因利益冲突而分道扬镳。随着三国实力增强，政治地位的稳定，原先合作的利益基础逐渐崩溃。三晋国土相连，谁都想向外扩张，利益冲突不可避免，联盟已难维持，于是便各自行动，向外扩张。毕竟，韩、赵两国也是中原强国，具有相当实力，面对魏国的威胁，两国开始采取一切措施，竭力自救。如赵国迁都邯郸后，国势逐渐强盛，赵敬侯便决心与大国争雄，出兵进攻卫国，并逐渐疏远魏国，而与齐国的关系则越来越密切。韩国也向周边的郑、宋扩张，借以扩大地盘。尤其是，魏国势力强大，限制了韩、赵的发展，对两国形成威胁，促使赵、韩联手，以抗衡魏国。

在此情况下，魏国本应从战略全局出发，坚持与韩、赵的同盟关系。因为，在存在各种不同力量的世界上，各方力量的消长和互为作用导致战略格局的动态变化，进而决定了多极形势下国家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因而制定正确的结盟政策无疑是必要的。而结盟战略目标的确定、盟友的选择、结盟时机的把握，既是对现存战略格局、战略态势的积极回应，体现着自身的现实利益要求和对未来的预期，同时又将改变业已存在的战略格局并影响到其未来的发展变化。就魏

国而言，其霸业是建立在与赵、韩联合的基础之上的。魏国要发展，首先就要谋求与赵国、韩国的联盟，争取恢复到当年魏文侯时代那种局面。也就是说，三晋联合，事业就兴盛；三晋分裂，就是自撤藩篱。但魏惠王于前 370 年继位后，不断偏离联盟路线，他倚仗强大实力，四面出击，到处树敌，不惜破坏与韩、赵的同盟关系，企图吞并韩、赵，独占中原，于是魏国与赵、韩两国利益冲突不断激化，屡动干戈。

魏国不谙战略形势而伐赵、伐韩的鲁莽之举，不仅欲速则不达，而且还使自己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地位，同时也导致其他诸侯国的忌憚与算计，成为矛盾漩涡中的公敌。

因为，进入战国中期，中原各大国相继实行封建改革，废除旧制度，推行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谋求富国强兵，在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通过变法，各国相继建立了人数众多、装备精良、颇具战斗力的新型军队。这样，随着各大国变法运动的兴起及魏国国都东迁，战国初期魏国一枝独秀、称霸中原的形势开始转变，大国间争雄决胜、相互抗衡的局面逐渐形成。其中以秦孝公和齐威王的变法较为彻底，成效最大。秦、齐两国早在春秋之世就是大国，齐威王、秦孝公的改革又使齐、秦成为东、西方的两个强国，与最早强盛起来的魏国分庭

抗礼。楚国虽变法较晚，但根基深厚，国土最广；赵、韩两国封建化较早，在战国初期发展较快，也跻身于强国之列。燕国改革较晚，但因地理位置等关系，在强国争雄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这样，齐在东，秦在西，楚在南，三晋居中，燕在北，各占一方，形成了七强并立的局面。

本来，魏国地处中原腹心，被称为“天下之胸腹”，四周大国环列，西有秦、韩，北有燕、赵，东有齐，南有楚，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战略地理环境较为恶劣，是典型的“四战之地”，很容易陷入多面作战的不利境地，而腹背受敌、内线作战，向来为兵家大忌，在多极斗争中尤其如此。要摆脱这种不利地位，主攻方向只能有一个，而不能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可是魏国几代统治者对自身在地缘环境上的先天不足缺乏足够认识，反而采取了战略上四面出击的错误战略方针，这不但分散了力量，消耗了实力，而且也四面树敌，陷于战略上的被动。尤其是，魏国的勃兴和崛起直接威胁和损害着楚、齐、秦等大国的利益，引起这些国家普遍的恐惧和嫉恨。齐、秦两大国自东、西崛起，奋力抗魏。其中尤以齐、魏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

齐国自西周以来一直是雄踞东方的大国。从地理环境上说，齐国是“负海之国”，位于山东半岛上，三面环海，有渔盐之利，经济基础相当巩固，战略资

源雄厚，足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同时，三面环海而无须设防的安全环境，使其处于中原争战之地的边缘，在争霸战争中没有后顾之忧，既可西进角逐霸主地位，也可退而固守山川形势。此外，齐国为西周开国元勋姜太公（姜尚）的始封之国，自分封后，齐国即成为东方第一大国。进入春秋以后，齐国国力有增无减，至第 16 代君主齐桓公统治期间，更在一代名相管仲的辅佐下“尊王攘夷”，成就一代霸业，成为“五霸之首”——各诸侯国的领袖。齐桓公死后，齐国虽丧失了霸主地位，但仍不失为东方头号强国。前 356 年齐威王即位后，面临魏国向东扩张的严重威胁，一方面发愤图强，招揽贤能之士，改革吏制，强化中央集权，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另一方面，制定和执行比较正确的争霸方略，准备积极利用韩、赵和魏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趁魏国陷于多面受敌的内线作战之际，展开对魏的斗争，并伺机同魏国一决雌雄，夺取中原霸权。

多极斗争的复杂环境和齐魏争霸的严峻形势，使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提供了造就天才的社会舞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有了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便呼之欲出，他就是我们本文要介绍的名传千古的兵家亚圣——孙臧。

二 “齐国兵学甲天下”

孙宾之所以成为兵家亚圣，固然有着时代的风云际会，但同样重要的，他有幸生活于一个兵学文化传统极为浓厚的国度——齐国。齐鲁兵学的肥沃土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兵学大师。

中国自古就是兵学大国。先秦时代，兵学群体、流派繁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三晋兵学、齐鲁兵学和以楚、吴、越地区为主要阵地的南方兵学。

三晋兵学指春秋时晋国、战国时韩、赵、魏一带的中原兵学文化。此外，关中地区的三秦兵学文化因主要受三晋兵学文化的影响，缺乏自己的显著特色，故也可以归入三晋兵学文化类型。历史上，三晋处于四战之地，战略上为内线作战态势，地理上缺少天然屏障和回旋余地。为了在激烈残酷的争霸兼并斗争中争取主动，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诸侯国对内注意改革、练兵、储粮，提倡法治，广揽人才，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外则随时权衡“国际”形势，利用矛盾，结

交各国，合纵连横、纵横捭阖。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三晋地区（也可以理解为中原地区）的兵学文化，注重将厉行耕战、增强实力、推行法制、严明赏罚置于优先的位置。具体地说，就是在战争观上积极主战，强调通过战争的手段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画策》）。在治军观上，主张高度集权，严格治军，追求令行禁止的效果，“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韩非子·饰邪》）。在作战指导上，强调以实力发言，先为不可胜，讲求打歼灭战，以消灭敌之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在战略上，特别重视处理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提倡文武并用；“凡战法必本于政胜”；“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商君书·战法》）；“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尉缭子·兵令上》）。这些特征在魏国、赵国的争霸战争、秦国的统一战争实践以及《尉缭子》等三晋兵学著作和《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的论兵之作中都有显著的体现。

南方兵学是以楚、吴、越三地区为代表的兵学文化，盛行于江汉淮水流域。这一地区受西周礼乐文化的影响较小，最早在军事上实施改革。此外，这一地区诞生过老子和庄子，是老庄道家哲学以及后学黄老思想的大本营，其基本特色是崇尚自然。老庄之后，这里成长起来的人物大都是智术型的，政治家则多权

谋，兵学家则讲究“诡诈譎变”，主张人道与自然的统一，从自然中汲取营养，以求为指导战争提供启示。隐忍待机、善于守拙、“先为不可胜”、后发制人、避实击虚、诡诈用兵、以柔克刚、外柔内刚、柔中有刚，都是这一兵学派别着力提倡的，他们追求的是力争巧胜而不硬拼。历史上，伍子胥、范蠡堪称这一流派的代表。当然，这一兵学流派与齐鲁兵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如他们推崇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尚，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就指出：“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本谋。”也就是说，姜尚是权谋奇计的鼻祖。《孙宾兵法·陈忌问垒》所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明白地告诉人们，出自北方齐地的孙氏家族的兵学，孙武在吴越战争中得到明显的验证，孙臆在齐国的争霸战争中做了阐明和发扬光大。可见，齐鲁兵学的代表“孙氏之道”——孙武、孙宾的军事理论，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既对春秋时的吴国、越国有重大影响（孙武曾向吴王阖闾献过《十三篇》，并曾担任过吴王阖闾的将军），又在齐魏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受过战争实践的检验，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至于齐鲁兵学，则是以齐国为大本营的兵学流派。齐鲁文化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诞生了博大恢弘的孔孟儒学，而且孕育了绚丽夺目

的兵学文化。

齐鲁兵学之所以发达，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的。

齐鲁兵学的发轫者无疑是东夷文化的“尚武”精神。蚩尤所代表的“兵主”传统和孔武有力的精神风貌是齐鲁兵学的深远的历史渊源。在中原已建立奴隶制国家夏朝，进入文明社会后，东夷以善射著称的杰出军事领袖后羿，东征西讨，平定统一了东夷诸部，并参与了争夺夏朝统治权的斗争。此后，东夷的后裔——齐国的创始人姜太公也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他不仅将西周礼乐文明和“古司马兵法”所蕴含的“军礼”传统带到了齐国，而且在剪灭商朝和平定商朝贵族叛乱的军事实践中，逐步建立了自己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史载周文王曾“与吕尚阴谋修德以顷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居多”。

同时，齐国从姜太公始封起，虽然一直是泱泱大国，但其地与中原“悬隔千里之外”，处于中原争战之地的边缘，自成格局，感受不到来自外部的威胁。加上经济发达，百姓富足，所以齐国长时期里没有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方针，而优越的生活环境也使齐国百姓不乐意于耕战，这直接导致其军队战斗力不强。有关文献的记载，诸如“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

齐号为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吴子·料敌》）云云，就比较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态势，齐、鲁两国终先秦之世尤其注重于对兵学的研究，提倡运用谋略，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后发制人，乘敌衰竭”的战术运用；孙臏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批亢捣虚”、“减灶诱敌”的作战指导，就突出地反映了齐鲁诸国借重谋略兵学的优势以弥补军队战斗力不够强大这一特点。应该说，这种军事实力与军事理论创建之间所存在的成反比的现象，在中外军事史上是相当普遍的，具有一定的共性。如宋代，军事积弱，边患不断，在与西夏、辽、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结果导致宋代兵学的高度发达，形成中国兵学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又如，近代欧洲国家中，意大利在军事上乏善可陈，败多胜少，结果“制空权”理论由杜黑首先提出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此也可见齐鲁兵学文化繁荣的大致原因。

此外，齐国统治者对本国优秀军事文化传统一直致力于保持和弘扬。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齐国统治者长期实行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尊重和网罗人才，既重应用之术，又重基础之学，致力于繁荣学术，从而造

就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发达局面。齐国从齐桓公时起，就在国都临淄的稷门（西门）之外建造学宫，设置大夫的称号，招揽天下贤能的知识分子。对于出类拔萃者，不仅授予大夫的称号，还在市区替他们建造高大宽敞的住宅，鼓励他们高谈阔论、著书立说。这些人既可以对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可以对国君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赞美或抨击，甚至还可以同国君展开面对面的辩论。这一做法在战国中晚期得到了延续和发扬光大。齐威王、齐宣王时，稷下学宫再次兴盛，规模更加扩大，人才济济，发展到一千多人，这些学者在享受到优厚待遇的同时；“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治而议论”，从各个角度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政策提出建议，并展开学术辩驳和交融，整理典籍，弘扬文化。这种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是当时其他诸侯国家所不具备的。这无疑保证了兵学文化的健康发展。

结果，齐鲁大地涌现出了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孙臏等众多著名的兵家。其兵书数量之繁复、思想之精粹、范围之广泛、个性之鲜明、影响之深远，在先秦各地区是首屈一指的。这首先表现为兵学著作数量繁复，蔚为大观。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兵学著作大部分都诞生于齐鲁大地。宋代官修的《武经七书》，作为兵家的必读经典，收入五种先秦兵

书，属于齐地兵家系统的就有三种，即《司马法》、《孙子兵法》和《六韬》。此外，被誉为“兵家翘楚”的吴起，有《吴子》传世。吴起出生于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西北），曾在鲁国任将军一职，他的妻子则是齐国人。这充分说明兵家文化是齐鲁文化中的一朵艳丽奇葩，同时也是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所独具的魅力和风采。另外，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载，齐国的重要兵学著述，还有《齐孙子》（即 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臧兵法》）89 篇，《子晚子》（今佚）35 篇等等。而在《管子》一书中，兵学思想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涉及的军事问题的篇目就有《兵法》、《制分》、《七法》、《地图》等近 20 篇。这些情况表明，在先秦及两汉传播的兵学著作中，数量最为丰富、内容最为精博且影响最为深远者，当首推齐国兵学著作。因此，长期以来，素有“齐国兵学甲天下”的说法。

尤其是在先秦兵学依次递变、逐渐升华的四大阶段中，齐鲁兵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先秦兵学的发展，曾先后经历了四个依次交替、逻辑嬗变的重要阶段。一是起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迄殷周之际的披着神秘迷信外衣的前理性阶段；二是以古代“王者司马兵法”为主要载体，反映“军法”（也称“军礼”）显著特色的初始阶段；三是以《孙子兵法》的出现为标志，“诡道”原则确立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转折发展时

期四是以《六韬》、《管子》成书为显著标志的综合融会、全面总结的成熟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之中，唱主角的始终是齐鲁兵学。第一阶段，其发轫者无疑是东夷文化的“尚武”精神，是蚩尤所代表的“兵主”传统和孔武有力的精神风貌。第二阶段，是周公旦所缔造的礼乐文明和“古司马兵法”所蕴含的“军礼”传统，它们的大本营均建立在齐鲁文化之上。同时，齐国作为西周开国元勋姜太公的始封之国，较好地传承了姜太公的兵学精髓。可以说，以姜太公为代表的崇尚权谋奇计的兵学传统，在更大程度上规定了齐鲁兵学的发展方向，使其显示出不同于其他兵学流派的特点。第三阶段，孙武、孙臯、吴起皆是齐鲁兵学文化代表者，孔子、孟子、墨子等人更是齐鲁文化的象征，他们著述中所反映的军事思想，毫无疑义为当时乃至整个古典兵学的主体。第四阶段，《六韬》、《管子》以该时期齐鲁兵学典范身份而承担起总结先秦兵学之历史重任，综合融会、总揽贯通先秦兵学之大成，于中国军事文化发展厥功甚伟。这一切表明，先秦兵学逻辑嬗变、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齐鲁文化发挥影响、规范方向的历史，就是齐鲁兵学占据主流、风靡天下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先秦的三大兵学类型之中，齐鲁兵学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代表着先秦兵学的主体构成与最高成就。

一定程度上，齐国正是依赖于博大精深、发达和